

《法音》文库

房山石经之研究

樸

初



中国佛教协会

房山石经之研究

中国佛教协会出版

《法音》文库

房山石经之研究

中国佛教协会出版



《法音》文库

(四)

房山石经之研究

中国佛教协会出版

北京法源寺流通处流通

1987年9月出版



目 录

- 房山石刻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拓片题记.....赵朴初（ 1 ）
- 房山石经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简介.....林元白（ 8 ）
- 房山石经内发现两种《梵本心经》.....胡继欧（ 6 ）
- 房山石经保存的《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》
- 真谛译本.....姚长寿（ 9 ）
- 房山石刻《大智度经论》整理记.....任 杰（ 15 ）
- 房山石经中新发现的两种佚书过目记.....任 杰（ 52 ）
- 房山石经中保存的契丹国慈贤译经.....任 杰（ 58 ）
- 房山石经述略.....吴梦麟（ 65 ）
- 房山云居寺石经.....黄炳章（ 88 ）
- 房山石经辽金两代刻经概述.....黄炳章（ 108 ）
- 房山石经题记历史资料初探.....张建木（ 135 ）
- 房山石经与《契丹藏》.....周绍良（ 167 ）
- 房山县云居寺《谦公法师灵塔铭》.....徐自强（ 177 ）
- 房山县云居寺《千人邑会碑》初探.....金 申（ 182 ）

房山石刻《称赞净土佛 摄受经》拓片题记

赵朴初

房山石刻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一卷，唐永徽元年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大中七年幽州大都督张允伸施造。经碑正面上部线刻三佛坐像，中刻经题，两侧刻菩萨立像，下部刻经主官衔姓氏及刻造年月。画像端严，书法道丽，洵为晚唐房山石刻佛经中希有遗物。

奘译此经为什译《阿弥陀经》之同本异译，唐代颇为流行，奘门弟子靖迈、窥基等注疏述赞前后出现。其后什译《阿弥陀经》盛行，列为净土三经之一，奘译之经遂渐无闻。此经碑版秘藏石室已历千载，向未为世所知，今始由中国佛教协会发掘拓印，法宝重辉，弥足珍贵。石刻经文与《大正藏》所载若干段落次第，略有出入，足供校勘之比较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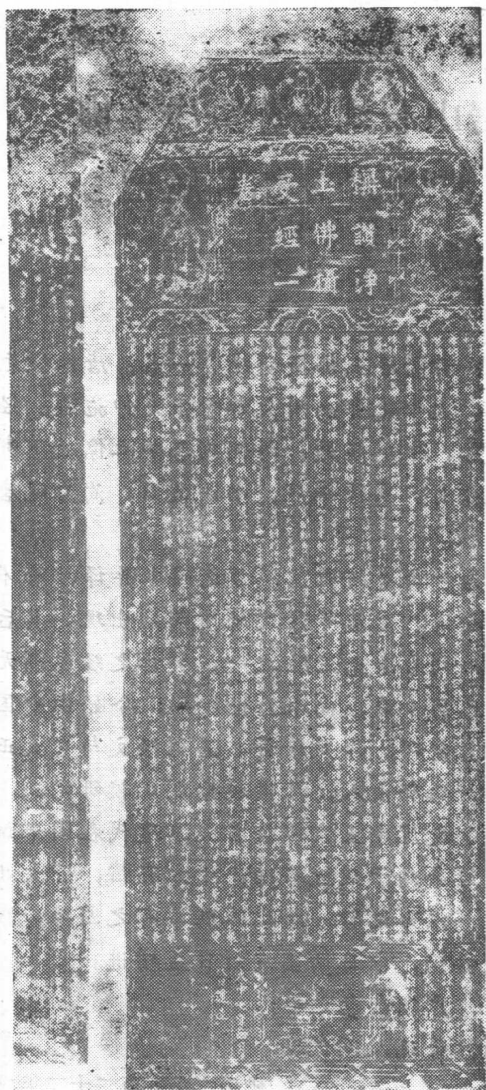
顷者，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首次派遣代表团来访我国，适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最近缔结，十方有情，皆大欢喜。谨以此经拓本奉赠，以为纪念，藉此殊胜希有之因缘，祝愿日本佛教昌隆，人民安乐，中日两国友好日益增进。

诸佛摄受，广敷杂色之华；

净土庄严，普现人间之世。

佛历二千五百二十二年戊午之秋

中国佛教协会 赵朴初敬识并书



《稱讚淨土佛攝受經》拓片

房山石经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简介

林元白

房山石刻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一卷，唐三藏法师玄奘译，大中七年（853年）幽州大都督张允伸施造。此经秘藏房山石室已历一千百有余年，是现存此经石刻最古的一种版本。

这部石经藏于石经山第九洞。经文环刻于经碑正背及两侧，书法遒丽，略兼行楷，是晚唐房山石刻佛经中希有的代表性遗物。

据《开元释教录》卷第八记载：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，唐高宗永徽元年（650年）玄奘译出，它和姚秦鸠摩罗什所译《阿弥陀经》为同本异译。^①《阿弥陀经》梵本，前后凡有三译。初译为姚秦鸠摩罗什所译《阿弥陀经》，第二译为刘宋求那跋陀罗所译《小无量寿经》（此经今已失传），第三译即玄奘所译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。此经译后，一时颇为流行。奘门弟子靖迈著有《经疏》一卷，窥基著有述赞一卷。此外，新罗的义寂、太贤等义学沙门又各有《经疏》及《古迹记》等著作传世。后来由于什译《阿弥陀经》盛行流传，成为所谓“净土三部经”之一，奘译遂渐无闻。

我国佛教译经史上，一般有旧译新译之分。旧译以罗什为代表，新译以玄奘为代表。二者在译语上有许多显然不同。罗什译经，以文字流畅便于讽诵为主，大体属于意译。奘译佛经，音译义译，力求忠实原文，一般较重直译。因此，这部经的译语与什译《阿弥陀经》译语，是研究玄奘与罗什新旧二译

很好的比较资料。如经首什译的“佛”字，奘译作“薄伽梵”；②什译的“舍卫国”，奘译作“室罗筏”；③什译的“比丘”，奘译作“苾芻”；什译的“众生”，奘译作“有情”等，这些在玄奘、罗什新旧二大译师的译经中都是常见的译倒。

据日本故望月信亨博士介绍，“梵文阿弥陀经，1880年马格斯牟勒(Max Muller)曾为英译，收于《东方圣书》(Sacred Books of the East)第四十九卷。1908年南条文雄氏又将它译成日文。罗什译本成立最古，梵文次之，玄奘译的经本似乎比较在后代。”④这个说法值得学者进一步的研究。

房山石刻和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(略称《大正藏》)第十二卷所收的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比较起来，有几段经文次第，详略各有不同。如《大正藏》所载此经第三段与第四段和房山石刻经文，次第大不相同。房山石刻经文第三段，七宝名称在前，继则列举四形、四显、四光、四影。而《大正藏》经文则将七宝名称及四形、四显、四光、四影置于第四段，而于其前详列八功德水的名称，此为房山石刻所无。又石刻第四段经文则与《大正藏》第五段相同。此外经文大略一致。

房山石刻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的书法，颇多简体字和别体字，这是晚唐所刻石经的特色。如無作无、爾作尔、來作来、號作号、惡作恶、软作奕、輿作典、網作纲、圍作围、藁作藁、藐作藐、世作世、匝作币、莊作疰、碍作寻等数字，和我国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大致相同，可见自唐以来简体书法早已形成。然而石刻经文中也有若干脱字误字和倒刻的情况，和盛唐石刻佛经比较略有逊色。

最后，关于经主张允伸这个人，《新唐书·藩镇卢龙列传》第一百三十七有传。晚唐房山石刻佛经中有张允伸施刻题记的达四十余部，计自大中七年至咸通四年(853—863年)前

后约十余年间。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刻于大中七年（853年），是张允伸最初施刻的一部石经，他自署的官衔是：“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观察处置、押奚、契丹两蕃、经略卢龙军等使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工部尚书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张允伸。”这条官衔题记，足以补充《唐书·张允伸传》的缺遗，也是研究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很好的参考资料。

① 唐智昇《开元释教录》卷第八：“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一卷，见《内典录》第三出，与罗什《阿弥陀经》等同本，永徽元年正月一日，于大慈恩寺翻经院译，沙门大乘光笔受。”

② 薄伽梵，一作婆伽婆，是梵语Bhagavat的音译，意为《世尊》，是佛十个名号之一。《佛地经论》第一“佛具十种功德名号。”“此一名笼摄众德，余名不殚。是故经首皆置此名。”

③ 什译《阿弥陀经》的“舍卫国”（亦称舍卫城）梵译作“室罗筏”，是室罗筏悉底（Sravasti）的略译。慧苑《新译华严经音义》卷下：“室罗筏国，旧云舍卫国，具称室罗筏悉底，此翻为好道”。舍卫城是古代印度憍萨罗国的首都，释迦久住之地。《分别功德经》第二：“佛在舍卫经二十五年，比在诸国，为时最久。”

④ 见1937年望月信亨著《佛教史的诸研究·关于〈阿弥陀经〉的成立》。

房山石经内发现 两种《梵本心经》

胡继欧

《心经》是一部《大般若经》的提纲，又是这部经的总结，文约义赅，为佛家讲说、诵读最广的一部经。因此，它的译本也比较多，现在知道的就有十三种，常见的有以下七种：

1. 《摩诃般若波罗密大明咒经》一卷，姚秦鸠摩罗什译。
2. 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一卷，唐玄奘译。
3. 《普遍智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一卷，唐法月重译。
4. 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一卷，唐般若共利言等译。
5. 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一卷，唐智慧轮译。
6. 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一卷，唐法成译。
7. 《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经》一卷，宋施护译。

这部译成汉文只有几百字的经典，历代竟有这么多的译本，可见此经的重要性和人们对它的重视。

上述这些《心经》译本，在房山石经中有唐、辽、金三代刻本三十余部。虽然多数是复刻，但鸠摩罗什、玄奘、法月、施护四家的译本俱全，只有般若共利言、智慧轮、法成三家的译本未见镌刻。

《心经》除汉译本外，还有玄奘所传只标梵音的《唐梵翻字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译本，在敦煌石室中发现抄本，书前有题记说是从“西京大兴善寺石壁上录出”，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，原文已收入日本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中。

我们在房山石经中还发现另外两种《梵本般若波罗密多心

经》，一为唐代不空译，一为辽代慈贤译。不空译本列于《千字文》编号〔感〕字帙，《至元法宝勘同录总录》曾著录；慈贤译本编号在〔丁〕字帙，未见著录，久已无人知晓。

两本都是金代所刻。按其《千字文》编号，应是以辽刻《契丹藏》为底本。佛教在宋代以后密教大兴，《契丹藏》在《开宝藏》的基础上增收了密部经典，所以这两种梵音《心经》遂被收入《丹藏》保存下来。当时玄奘的梵音《心经》可能已经不传，所以《丹藏》未收，房山石经中也就没有它的刻本。

把不空、慈贤两种传本加以比勘，发现它们只是同本异译。不过，两本除了所用代音字不同之外，分句也不尽相同。如“观自在菩萨”句，不空本作一句，慈贤本则分为三段：作“圣观自”、“在”、“菩萨”；又如“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”，不空本作一句，而慈贤本则分为“深”、“般若波罗密多”、“行行时”三段。这些虽然只是吟诵时音节顿挫的差别，但也不无梵音传习之异，对于研究梵汉音韵是有参考价值的。

自鸠摩罗什创译《心经》于“照见五蕴皆空”句下有“度一切苦厄”五字后，玄奘重译此经时，也同样有此五字；相传梵文原本上是没有这五个字的。自玄奘传本《唐梵翻字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发现后，证明传说是对的。罗什译此经时，大概因为经尾有“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”句，说明诵经的效果，为了突出这一点，遂在开卷处加了“度一切苦厄”一句；玄奘译经一向是非常重视原文的，从不轻易增减，他在继译此经时，当然会参考罗什译本，大概他觉得罗什将经尾之意移增于经首比较贴切，所以也就保留了这五个字。现在又发现了不空和慈贤的梵音传本，核对原文，也与玄奘的梵音传本一样，

没有罗什所增加的那五个字，可见此经的梵文原本是一致的。

一部经重译的现象是常有的，但重译至十余次之多，则只有《心经》一部；而且，不但有十种汉文译本，还有三种梵音传本。足见《心经》在显、密教中都同样受到重视。

房山石经中两部失传的《梵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的发现，在《心经》的传译史上是一件重要的事。它说明辽代密教兴盛，读诵《心经》多用梵音，所以慈贤重传梵本，与不空传本一并收入《契丹藏》中，而房山石经又据以刊石，遂得以传世。

房山石经保存的《文殊师利 宝藏陀罗尼经》真谛译本

姚 长 寿

《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》，亦名《文殊师利菩萨八字三昧法》、《文殊法藏经》、《法宝藏陀罗尼经》。此经属杂密经，主要内容为文殊八字法。先说陀罗尼功德，次举广深智雷音王如来等八如来及月光菩萨等十菩萨陀罗尼，颂其功德。次说画像法，曼荼罗坛印仪规，沙罗王佛等十一佛，大精进印，十种果报等。经中说“我灭度后于此瞻部州东北方，有国名大振那，其国中有山，号曰五顶，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，为诸众生于中说法”。这是续旧译《华严经》之后明确提出五台山为文殊灵场的一部经典，对中国、朝鲜、日本和整个亚州的佛教有着很大的影响。

此经现行藏经存有两种译本。一本是《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》，一卷，《高丽藏》收录，入〔讚〕字函，大唐南印度三藏菩提流志译。

另一本是《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》，一卷，宋元明清各藏皆入藏，《磧砂藏》、《普宁藏》俱入〔羔〕字函，《明南藏》入〔景〕字函，《明北藏》、《龙藏》俱入〔羊〕字函，皆作“唐天竺三藏法师菩提流志译”。

房山石经也收有两种译本，均入〔羊〕字函，一是辽保大元年（1121）刻本，题作：

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

大唐南印度三藏菩提流志译

一是金天会十年（1132）刻本，题作：

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一卷

三藏真谛奉制译

三藏宝思惟依梵本再勘定

今将房山石经本与现存诸藏本对勘，《房山石经》菩提流志译本和《高丽藏》本内容文字完全相同，无疑系出同一底本。

《房山石经》真谛译本和宋元明清各藏本稍有不同。画像法之后的偈诵，石经本有“并诸凡庶类”、“常于五浊世”、“谤毁诸佛法”三句，宋元明清各藏本缺。十种果报之后的偈言，石经本有“大力那罗延，常乘金翅鸟。满诸外道愿，皆是文殊力”四句，宋元明清各藏本无。宋元明清各藏本在十一佛名下分别有佛名梵字音译，石经本删略，宝思惟在经末附注：

“十九纸内有梵云字十一对，为无别本，不敢出”。文字上也有若干处不同，比如宋元明清各藏本“无量无边诸佛世界”、“河澄羯”、“车路车印”、“无量寿智佛”，石经本作“无边诸佛世界”、“咽单”、“车辂印”、“无量牵知佛”等等。对勘结果，内容大同小异，两种译本的译者当为同一人，不可能是同本异译。但宋元明清诸藏本皆署名“唐天竺三藏法师菩提流志译”，石经本却作“三藏真谛奉制译三藏宝思惟依梵本再勘定”。译主迥别，孰是孰非？

翻检经录，《开元录》卷九《总括群经录上之九》菩提流志译条：

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一卷

景龙四年于西崇福寺译

弟子般若丘多助宣梵本

卷十二《有译有本录菩萨三藏录之二·大乘经重单合译下》：

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一卷

大唐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译

新编入录

卷十七《别录中删略繁重录第四》：

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一卷

大唐三藏菩提流志译

新译补阙编入

卷十九《入藏录·大乘经单译》：

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一卷一十七纸。

又《开元录略出》[讚]字函：

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一卷

唐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译

以上《开元录》所录本仅著录了此经的一种译本，即现存《高丽本》、《房山石经》菩提流志译本。此可以石晋可洪《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》来验证。《随函录》第九册[羊]字函，录有此经的两种译本，其一本题作：

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一卷

大唐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译

可洪注云：“不合《品录》。《开元录》云十九纸，单译。此本合《开元录》”。

《品录》即《一切经源品次录》，已佚，三十卷，沙门从梵撰。“此本”指《随函录》所依《河府方山延祚寺藏》中的《下方本》。今验之以《高丽本》、《房山石经》菩提流志译本，字例完全相符。可洪云“此本合《开元录》”，那末《高丽本》、《房山石经》菩提流志译本亦即《开元录》所录本，

当为无疑。据《王守泰山顶石浮图后记》载：“大唐开元十八年，金仙长公主为奏圣上，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，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”，送经僧中有《开元录》撰者智昇。开元十八年（730）为《开元录》作成之年。《房山石经》菩提流志译本的镌刻底本可能就在此四千余卷经卷之中。

《随函录》又著录此经的另一别本：

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一卷

未详译代人名，出《品次录》，

廿五纸，不合《开元录》。《下

方延祚寺藏》依《开元录》不入此本。

可洪有详细附注：

右按《开元录》云，大唐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译，十九纸，单译。《品录》亦云大唐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译，二十五纸。洪详此经，若在《开元录》前出，不应言单译；若在《开元录》后出，不应预记得纸数也。然此本与《开元录》本文句周备，大同小异耳。当藏不入此本，今但录其文字于册内，以防诸藏有此本用之也。与前卷同本别译，不是伪经矣。将《随函录》所录文字与《房山石经》真谛译本比勘，基本相同。《房山石经》真谛译本宝思惟注曰“十九纸内有梵云字十一对。为无别本，不敢出”，《随函录》可洪注曰“此本内十一佛名下只书梵云字，并无梵语也”，所言一致。可以推想，《随函录》所录此本与《房山石经》真谛译本应该源于同一底本，正如可洪所言，与菩提流志译本，当为同本别译。《大正藏》收录此经的两种译本，编入同一帙号1185，分作为A、B两本。A本底本为《高丽藏》，校本无。B本底本为《明本》，校以《宋本》、《元本》。《大正藏校勘目录》云：“此经丽本与三本异，故今两本并载”。《大正藏》编者看到了有“异”，惜未勘出异处正在于此“同本别译”。但《随函录》说此本

“未详译代人名”，可能是《品次录》未载译代人名。明确署名有真谛译本的记载，可见于《宗叡录》和《至元法宝勘同总录》。

日僧宗叡于唐咸通三年至六年，日贞观四年至八年（862—865）入唐，回国时带回经论章疏一百三十四部、一百四十三卷。在其所著《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》中著录有：

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一卷

真谛宝思惟等三藏译，说真

言威力受持者功德不可思议

译者与《房山石经》本同，可见此本在唐代已流传国外。《大正藏索引》编者说宗叡本是“误记”，编者未见《房山石经》，自然只能是一种臆断。

《至元录》卷六〔如〕字号：

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一卷

陈天竺三藏真谛译 新编入录

无疑此即《房山石经》保存的真谛译本。在未发现《房山石经》真谛译本之前，人们自然对《至元录》的这一著录无从对证。所以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说“先作真谛译〔至〕。今勘同唐译文殊宝藏陀罗尼经”，而误勘为“失译”了。

此本真谛何时译出，因无其他资料可证，已无从查考。勘定者宝思惟译经时期大约在唐则天长寿二年至中宗神龙二年（693—706），“自神龙已后更不译经，唯精勤礼诵修诸福业”（《开元录》卷九），宝思惟的勘定本应当在706年之前即以流传，以后可能被《契丹藏》收藏，而在《房山石经》中得以留存。《碛砂》、《明藏》诸藏未见《高丽藏本》、《房山石经》菩提流志译本，据以刊刻的可能是《随函录》著录的“未详译代人名”本。因《开元录》著录的此经译人译时译地